

虛擬政治：沒有人民的政治

凱文·羅賓斯¹
倫敦大學

富蘭克·維伯特²
伯明罕大學

譯者：

何朝陽
中國科技大學外語系
zhaoyanghe@hotmail.com

王希華 包曉雲
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傳播與科技政策系
xihuaw@ustc.edu.cn

摘要

作者對時下討論正烈的新型虛擬文化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梳理并批判了傳播對社區的鞏固作用以及虛擬政治的可能性，指出技術文化只是烏托邦的又一種表現，而傳播本身長期以來都是促進社會秩序和社會控制的手段。傳播技術不可能成為社會和政治的萬能藥，因為我們面臨的根本的社會問題不是傳播匱乏。作者認為虛擬社區是一個興趣的社區，只存在于虛擬條件下，是對現實中對抗與衝突的逃避。因此，虛擬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

關鍵字：技術文化 虛擬社區 虛擬政治

[收稿]2003/5/25; [接受刊登]2003/6/4

¹ 凱文·羅賓斯(Kevin Robins)，英國倫敦大學哥德斯密斯學院傳播學教授，代表作有〈透視視像〉、〈認同的空間〉(與戴維·莫利合著，中文版已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技術文化的時代〉(與弗蘭克·威伯斯特合著，已由譯者譯出，將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

² 弗蘭克·威伯斯特(Frank Webster)，英國城市大學教授，曾就教于英國、美國和芬蘭的多所大學，研究興趣為資訊與傳播轉型中的社會變化，代表作有《資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新政治?》，《資訊社會的理論》(已被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和《控制的強化: 資訊時代的恐怖主義與戰爭》等。

“技術革命”的遠景掩蓋了當今變化的現實困境，甚至讓人相信當今世界正發生的一切實際上有助于社會和政治的改善。越來越嚴峻的分化和衝突的現實，在當今許多政治演說和宣言為迎合社會的一致和連貫的文言軟語中化解了。提倡技術文化一般總與敏感的傳播與社區概念聯繫在一起——通過加強傳播恢復社區——為在真實世界的無序變化中提供一個有序的避難之地。

技術文化的話語促使我們想到某種嶄新的東西即將來臨。但却幾乎沒有人思考——除非你已對新的設備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對新社群主義的渴盼，其實明顯沒有什麼真正的創新或革命。我們正擁有的實際上只是下一次將要宣布的陳舊的烏托邦形式而已。阿蒙得·麥特拉(Armand Mattelart)已將傳播、交流和社區的聯繫追根溯源到19世紀初的聖西蒙(Saint-Simon)。³傳播與透明度有關，因而和理解有關，因此與社會協調也有關：傳播的理想狀態或意識形態是“把人聚集到一起”，這種聚集被認定會鞏固社區的結合。麥特拉在其他地方指出，“傳播思想是作為抵消社會秩序不安定的調節原則”而出現的。⁴這種絕非先天解放的傳播意識形態或曰傳播宗教——也許已經從進步的意識形態那裏接手——作為促進社會秩序和社會控制的手段已經實行了200年之久。

傳播被用來促進更大範圍的社會理解性，因而又被認定能提高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廣泛和諧”。麥特拉認為將來的遠景是，“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將能以傳播等式的方式進行系統陳述”。⁵于是任何一個解決方式便以一種新的傳播技術定位來進行明確闡釋。因此林達·哈若西姆(Linda Harasim)例行公事地斷言，“人類為達到這一目的而傳播和發展新工具的需要，構成了文明與文化的歷史”，然後宣稱，新的電腦傳播網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充當創新的技術手段，“使

³ 阿蒙得·麥特拉，〈傳播的創造〉(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巴黎，La Decouverte, 1994年。

⁴ 阿蒙得·麥特拉，〈繪製世界傳播：戰爭、進步、文化〉(Mapping World Communication)，明尼蘇達州，馬薩諸薩州，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⁵ 同上，第218頁。

人類能用新的、有望更好的方式表達自己”。⁶另一網路狂熱者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全球相互聯絡的網路母體(the global Matrix of interconnected networks)促進全球衆多思想母體(global matrices of minds)的形成。”⁷另外，作為一個自覺的“後現代主義者”，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這次從自覺的“後現代主義”的角度提出了類似的的基本觀點，指出電腦的傳播于第二媒體時代至關重要：他認為因特網的意義，在于它正創建各類新型的“會面地、工作區和網吧，其中大量的圖文傳送變成相互交往的場所。”⁸假如傳播技術在任何一種這樣的情況中被看成是社會和政治的萬能藥，那一定是因為傳播中的不當或失敗被當成了我們所面臨的根本性的社會問題。

政治家同樣熱心于讓大眾接受這個充滿希望的資訊。美國副總統阿·戈爾甚至宣稱，“全球資訊高速公路”的傳播功效，使得“一個新雅典時代的民主”成爲可能。新的電子集會能“讓我們在同一地球社區裏共用資訊、聯絡和傳播”；能“讓我們在同一社區裏以及國與國之間交換思想”。⁹戈爾設想會有“一種全球交談，任何想發言的人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¹⁰在英國，新工黨也有自己類似的見解：

我們正站在一場革命的入口處，其影響和印刷機的發明一樣巨大。新技術能使傳播以衆多不同的形式在全球瞬間發生，并能以令人難以想象的範圍提供、搜索和獲取資訊，它們將給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帶來根本性的變化。¹¹

⁶ 林達·哈若西姆，〈網路世界：作為社會空間的網路〉(‘Networlds: Networks as Social Space’)，載林達·哈若西姆編輯的《全球網路：電腦與國際傳播》(Global Networks: Computer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康橋，MA，MIT出版社，1994年，第34頁。

⁷ J.S.奎特曼(J. S. Quarteman)，〈全球思想母體：作為社會空間的網路〉(‘The Global Matrix of Minds: Networks as Social Space’)，載林達·哈若斯編輯的《全球網路：電腦與國際傳播》，康橋，MA，MIT出版社，1994年，第56頁。

⁸ 馬克·波斯特，〈後現代的虛擬性〉(‘Postmodern virtualities’)，《身體與社會》(Body and Society)，1995年，第1卷，第3-4期，第192頁。

⁹ 阿·戈爾，〈鑄造一個民主的新雅典時代〉(‘Forging a new Athenian age of democracy’)，《媒介物》(Intermedia)，1994年，第27卷，第2期，第4頁。

¹⁰ 同上，第6頁。

¹¹ 工黨，《資訊超級高速公路》，倫敦，工黨，1995年。

我們被鼓動去把我們的希望寄于“能讓我們無論分布在世界哪個角落都能相互聊天、見面、共用圖像、文本和聲音的網路傳播鏈結上。”¹²大西洋兩岸的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家們似乎都認為，我們一旦能完全相互交談并享受這大一統的世界交談的話，“根本性的變化”就將真正到來。似乎世界性問題只是歷史上傳播潰乏造成的結果。

緊隨高技術傳播之贊譽的，必定是對技術社區政治上的理想化。有人，比如馬克·波斯特，從新型的流動、靈活的聯繫的角度，以後現代主義的認識設想虛擬社區——虛擬社區是“身份已被支解的母體，每一個斷片指向另一個斷片”¹³。但新技術社群主義一般都傾向于保守和懷舊：圍繞的總是發現和恢復原有的想象中的聯結。克裏斯蒂娜·奧登（Cristina Odone）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一新的意識形態。她宣稱“網路已經超越了那個曾擠滿家居生活、毗臨教堂的院落和鄉村集市的集體空間。”網路聯結“似乎重又點燃了那屬於傳統社區的核心的、令人難以琢磨的歸宿感”。政治洞察力在她的想象中象棉花糖似的被拉長了：

因此環球網是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第一個建築街區，建築在跨文化、多學科對話的基礎上，因邊緣的人(marginalized individual)的“賦予權力”(empowerment)和“授權”(enfranchisement)而得以鞏固。這是一個絢麗的新世界，在這裏通過把有聲交予無聲、把大眾空間交予個人而把心靈交還給智慮的實體。¹⁴

世界在這裏被設想成鄉村水泵或城鎮廣場的形象。因此處理它的問題似乎象解決地方社區中鄰里間的問題一樣容易。奧登簡明地說清了技術未來主義者(techno-futurist) 霍華德·萊思格爾德（Howard Rheingold）厚厚一本書才闡述清的問題，二者均充滿了相似的社群主義熱望。萊思格爾德在《虛擬社區》（The Virtual Community）一書中還試圖說服我們，因特網不僅是恢復社區感的現代手段，它還能達

¹² 同上。

¹³ 波斯特，前面所引作品的第 89 頁。

¹⁴ 克裏斯蒂娜·奧登，〈廣泛興趣的拼盤(‘A patchwork of catholic tastes’)〉，《衛報》(Guardian)，1995 年 9 月 18 日。

到“真正精神上的交流”。¹⁵這種電子福音主義(electronic evangelism)中確有一種真正的虔誠（我們認為，有點因襲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天主教式的神秘主義(Catholic mysticism)）。

政治家們也急于慶祝點燃社區希望的可能。他們抵制雷根和柴契爾式經濟自由主義帶來的沈重後果，并勇敢地承擔起努力再創社會和政治凝聚力的職責。爲了這個目標，他們求助于哲學和共產社會主義原則，尤其是在阿米特·以森尼(Amitai Etzioni)著作中有充分發展和宣傳的觀點。¹⁶以森尼的影響在美國政治（尤其與紐特·金理斥(Newt Gingrich)一起)和新工黨稱之的“堅韌而活躍的社區觀念”中都意義重大。¹⁷此外社群主義議程也證明自己易于與資訊超級高速公路的新技術文化政治相結合。阿·戈爾深受新技術可以通過電子類比杰弗遜式的市政廳（杰弗遜主張中央政府之管制儘量減少，個人權力不可侵犯等——譯注）來培養民主社區這一觀點所吸引。在英國，新工黨對美國感興趣的這種“虛擬城鎮會議”很關注。極欲相信新的資訊和傳播技術能把市民（或所謂的“網民”）拉回到互相“接觸”的狀態之中。對主張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家們來說，虛擬技術能迅速建起社區，因爲現在有服務（或曰商品）能被傳送到電子家庭——社區或交互場所供家庭消費。

在英國，這個新技術社群主義觀點受代表布萊爾耳目的思想庫的民衆(Demos)的積極宣揚。《民衆季刊》(Demos Quarterly) 很多期都有文章宣揚新技術實現民主社區的效能，比如“開放社會的網路系統”和“回到希臘：直接民主的機會”。¹⁸杰歐夫·繆根(Geoff Mulgan)（民

¹⁵ 霍華德·萊思格爾德，《虛擬社區》，倫敦，塞克爾和沃伯格出版社(Secker and Warburg)，1994年。

¹⁶ 阿米特·以森尼，《社區精神》(The Spirit of Community)，倫敦，方特納出版社(Fontana)，1995年。

¹⁷ 關於新工黨和共產社會主義的論述，見史蒂芬·戴佛(Stephen Driver)和盧克·馬特(Luke Martell)，《新工黨：柴契爾主義之後的政治》，康橋，政治出版社，1998年。

¹⁸ 杰歐夫·繆根，〈開放社會的網路系統〉(‘Networks for an open society’)，《民衆季刊》(Demos Quarterly)，第4期，1994年，第2-6頁；安德魯·阿道尼斯和杰歐夫·繆根杰，〈回到希臘：直接民主的機會〉，《民衆季刊》，3冊，1994年，第2-9頁。

衆的前任主席，現為布萊爾的顧問)在他的著述《連通性》(Connexity)中詳述了證實新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構想的合理性的理論框架。繆根把新的全球秩序視為其中的“世界已變得更加互相依賴和相互聯結……更多的人比以前更加依賴更多的其他人”。¹⁹連通性政治努力與這個幸運、良好的邏輯謀和協調，“消除界限和分離身份一直是人類痛苦和戰爭的主要原因。”²⁰目的是促進更大的透明感、互助感和信任感——面對面社區的直接關係是一個關鍵的參照點（我們甚至被告之，新技術許諾“人之間思想的直接連接，超越分離的自我和主體的概念”）。²¹繆根認為在新秩序中，“連通性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且更易于形成象虛擬的賽博空間社區或共用興趣或娛樂的鬆散社區那樣的新社區”。²²他認為未來將向這樣的方向發展，即“更多由許多小單位組成的結構由傳播鏈結在一起……。在由衆多小單位組成的秩序中，重要的是你在各種不同單位中的成員資格”。²³加入這些“小單位”就好象加入一個俱樂部：“俱樂部以成員為基礎，分享價值和共有的義務。理論上說他們基本上是互惠的”。²⁴這是一種新社群主義政策，一種成員資格和共用樂趣的政策。

我們認為這似乎是一個極無說服力的議程。（虛擬）社區觀念實際上躲入了穩定而有秩序的虛擬王國。理想的社會被想象成是密切的社區內相互間通暢的交流，不必考慮實際的地理位置何在（這些社區可能是“後現代的”分散的、支離破碎的主觀社區，也可能是保守市民的社會，他們認為自己具有中心、連貫的身份）。虛擬社區似乎對那些能進入虛擬生活、從地球變革的紛擾現實中退出來的人來說是最理想的。虛擬文化及其傳播意識堅持認為有“共同興趣”的人之間一定有一致性和共同性。也許現在只有在虛擬存在的條件下才能維持社區感？興趣社區否認——通過使用現在已很方便的新技術手段——真

¹⁹ 杰歐夫·繆根，《連通性：在一個鏈結的世界中怎樣生活》(Connexity: How to Live in a Connected World)，倫敦，Chatto and Windus，1997年，第1頁。

²⁰ 同上，第33頁。

²¹ 同上，第17頁。

²² 同上，第229頁。

²³ 同上，第118頁。

²⁴ 同上，第119頁、118頁。

實世界中的衝突與對抗。但我們要問的是，假如這些新技術實際上只是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組成部份，情況會是怎樣呢？假如它們真可能是實現公民的和民主的文化的條件，情況又怎樣呢？

西瓦納丹（Sivanandan）說得對，虛擬社區“是一個興趣的社區而不是人民的社區”（而“你需要人民來製造一場革命”，他補充說）。²⁵ 是分離感和無實體感的虛擬條件，在維持著興趣社區，而具體化的、實實在在地處于某地的存在狀態涉及的是和其他人民同生活的必要條件——不只是其他人在某個直接的社區中的生存條件——他們的生存狀態常常挑戰并挫敗我們自己的生存狀態。新的第三條道路代表了這樣一種政治，按斯拉夫·西在克（Slavoj Zizek）（延續了雅各斯·仰塞爾（Jacques Ranciere）的觀點）的話說，它“試圖延緩政治不穩定的可能，試圖竭盡全力否定它和/抑制它.....[并]回復到前政治的社會體制”。²⁶ 這是以社會（俱樂部）管理為名義的政治的中立。正如仰塞爾所說，它所提供的是沒有熱情的政治：“一個每個人都需要另外一個他人的世界；一個只要它作為個人享樂來提供，任何人都能進入的世界；一個什么都攪混在一起以自我撫慰的多樣性世界向我們展示的世界”。²⁷ 虛擬政治是沒有權力的政治，沒有對抗的政治，沒有人民的政治。這其實根本就不是政治。

²⁵ A.西瓦納丹，〈異教與預言：技術革命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輻射〉（‘Heresies and prophecie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all-ou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種族與階級》（Race and Class），1996年，第37卷，第4期第9、10頁。

²⁶ 斯拉夫·西在克，〈為‘歐洲中立主義’左翼偏激辯解〉（‘A Leftist Plea for “Eurocentrism”’），《批評性質疑》（Critical Inquiry），第24卷，第4期，1998年，第992頁。

²⁷ 雅各斯·仰塞爾，《在政治的岸邊》（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倫敦，Verso，1995年，第23頁。

Virtual politics: Politics without People

Kevin Robins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s,
Goldsmith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Frank Webster

Professor of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Translator

Zhaoyang He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Xihua Wang

Dep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Xiaoyun Bao

Abstract

The authors reflect and explore the prevalent approach to the new virtual culture that has been taking shape through the 1990s. By examining and criticizing the various claims of the enhance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virtual politics, we point out that technological culture is just another kind of utopian formulations. Communication is a means of promoting social order and control for a long tim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re impossible to become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anacea, because the fundamental social problem we faced is not a historical communications deficit. 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e virtual community is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only under conditions of virtual existence. It is a retreat from the conflicts and antagonisms of the real world. Virtual politics is thus not politics at all.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ulture, Virtual community, Virtual politics